



赵春晨 何大进 冷东 主编

中西文化交流 与岭南社会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0139899

赵春晨 何大进 冷东 主编

中西文化交流 与岭南社会变迁



9013989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赵春晨, 何大进, 冷东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3

ISBN 7-5004-4178-9

I. 中… II. ①赵…②何…③冷… III. ①文化交流—中国、西方国家—明清时代—学术会议—文集②社会变迁—岭南—明清时代—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G125-53②K248.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1217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特约编辑 孙锦文
责任校对 王应来 李 莉
封面设计 师若夫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电 话 010-840294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3.375
字 数 585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邮 编 100720
传 真 010-84017153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印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插 页 2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和岭南历史文化研究所的许多专家学者们于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外，一向关注和致力于岭南历史文化研究，科研成果丰硕，学术活动不断。他们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工作，令我和我的同事们颇为感佩。

今年7月，他们举办了“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议题集中在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及其对岭南地区（包括粤、桂、琼与港澳等地）社会发展的影响，同时探究了岭南地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内涵丰富，颇有新意，大有裨益于中西文化交流史和岭南社会史的研究，并对当前的先进文化的建设有着借鉴意义。

毫无疑问，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文化及文化取向愈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根本的意义上，文化及文化取向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前途和趋势，涉及社会演进的总体内涵，关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规范。史实证明，不同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大都是一种动因和契机，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往往对历史进程发生积极作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中留下了鲜明印记。

正是由于文化的重大外烁作用，作为近世中西文化交流津梁的岭南地区受到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政

治、经济学说和哲学等等，首先在知识分子中引发了观念的变易。然后，向更广大的群体扩展。由此，岭南地区文化才得以开风气之先和领风气之先。事实上，岭南文化的近代趋向显然是中西交汇，即与西方文化相冲撞与融合，开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阶段，导致传统文化架构逐步变为中西交汇的文化架构。岭南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商品文化的表征、开放与变革的取向……都显示了新的文化架构的内涵与特色。这种变化发展虽然形成于近代，但可上溯至明清时期。黑格尔断言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是有悖事实的，明清以来的岭南文化就是一个反证。

今天，当我们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的时刻，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了完成这项宏伟的任务，必须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历史的回顾，总结经验与教训，无疑是有利于先进文化建设事业的。

正是由于这个课题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热切希望岭南历史文化的研究能够深化与拓展。我之所以不揣浅陋，敢于接受春晨学友属意为序的要求，不外立意于聊以慰藉那些不断攀登的文化教育战线的斗士们，并祝愿他们为发展进步文化做出更多的奉献。

2002 年冬·广州

目 录

序	张 磊 (1)
---------	---------

试论东西方近代早期的思想文化启蒙	孟广林 (1)
------------------------	---------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	刘汉东 (16)
------------------------	----------

中国火药和火器在亚洲的传播和演进	冷 东 (32)
------------------------	----------

明清以来中医药学在欧美国家的传播	黄启臣 (50)
------------------------	----------

明末购募西炮葡兵缘由考	欧阳琛 方志远 (59)
-------------------	--------------

大同教传行中国始末	雷雨田 (83)
-----------------	----------

在粤英商团体与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	吴义雄 (98)
--------------------------	----------

从晚清书院看 19 世纪后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地域差异

——以尊经、广雅书院为例	谢 放 (117)
--------------------	-----------

再议郑和下西洋：以两次从广东启航为中心	李庆新 (135)
---------------------------	-----------

岭南——西医东渐的中心	盛永华 孙关龙 (152)
-------------------	---------------

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的行为特征及其内在动因

.....	吴 琦 赵秀丽 (163)
-------	---------------

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近代广东与广西教育

——以 20 世纪 30 年代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

与广西国民基础教育为中心	曹天忠 (179)
--------------------	-----------

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近代广东人才特色及成因

——以陈旭麓《中国近代史词典》

为切入点	尹可雨 (198)
论鸦片战争期间以岭南为中心的“借取”	
西洋武器浪潮	赵春晨 (208)
九江学派及其影响	冼剑民 叶美兰 (224)
华侨是岭东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主力	陈历明 (241)
晚清时期岭南出国留学生对中西文化	
交流的贡献	王晓莺 (251)
中西戏剧遇合下的粤剧“志士班”	陈永祥 罗素敏 (268)
清末中俄文化交流有关岭南的	
两则重要史实	李永昌 (282)
广州在早期中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梁碧莹 (296)
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广州的传播和应用	彭顺生 (313)
略论西关在广州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	何 薇 (332)
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	韦庆远 (345)
民初中葡澳门界务交涉与粤澳关系	陆晓敏 (371)
论澳门历史上的语言文化交流中心地位	徐霞辉 (384)
论阮元的西学思想	关汉华 颜广文 (391)
论阮元对岭南文化发展的贡献	胡 凡 李凤飞 (407)
潘振承的发迹考略	王丽英 (424)
叶名琛研究	林子雄 (437)
张之洞与广东治水	林家有 (452)
郑观应与中西文化	刘圣宜 (468)
论孙中山的行政管理思想	范耀登 (484)
论梁启超的西学传播	肖承罡 (500)
简论梁启超对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及权力制	
衡学说的介绍与引进	焦润明 (512)

罗香林先生对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之贡献 马楚坚 (525)

也谈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

交流问题 陈忠烈 李龙潜 (547)

明清之际岭南的“教堂文化”及其影响 邹振环 (569)

论西方传教士与明后期的岭南政治 刘祥学 (588)

利玛窦与庞迪我的关系辨析 林中泽 (601)

利玛窦旧藏书中的西方科技书籍在岭南

地区的流播 冯锦荣 (616)

十六世纪后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次开拓性实践

——罗明坚华南行迹考述 关汉华 (628)

赴华耶稣会士与莱布尼兹的中国文化观 何大进 (644)

雍正年间天主教传教事业在岭南的发展与挫折

——以 1732 年驱逐广州传教士往澳门之

事件为中心 杨文信 (657)

论《圣经》马氏译本对洪秀全的影响

——以“上帝”译名为例 张英明 徐庆铭 (678)

晚清广东教案述略 李吉奎 (692)

近代美国浸礼会国外传教会在潮汕

地区办学述评 徐鲁航 (712)

近代西方教会在粤东客家地区的传播及

其影响述略 韩小林 (721)

“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

学术研讨会综述 冷 东 (735)

试论东西方近代早期的 思想文化启蒙

考察明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个案研究固然是重要的，但也须作一些宏观性的综合考察。从近代早期思想启蒙的视角来分析包括明清时期的中国在内的东西方主要封建国家的思想文化嬗变，或许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领域中有关历史现象的理解。

一、有关启蒙的诠释

在思想文化史上，“启蒙”一词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启蒙”有启发心智、消除愚昧之意。在《易经》中，“蒙”为六十四卦之一，坎下艮上。《易·蒙》云：“彖曰：蒙，上下有险，险而止蒙。”王弼在《周易注》中释之云：“退则困险，进则阨山，不知所适，蒙之义也。”即表示处于进退维谷、难以应对的境遇。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则注疏云：“蒙者，微昧闇弱之名。”意指愚昧无知。“启”意味开导、启发。《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启敝邑之心”一说，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中注释道：“启，开也，开道其心，故得胜。”基于“蒙”、“启”的这些含义，后人用“启蒙”一词来指让初学者获得基本知识的

教育上的发蒙，或用之来指使后进者接受新事物而获得的启发，也用来指人类历史上弃旧图新的文化变革运动。从狭义上看，“启蒙”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特定概念，是指人类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作为英语的 Enlightenment、法语的 Illumination、德语的 Aufklärung 的译语使用时，“启蒙”特指 17、18 世纪在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权的社会批判思潮。在法国，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启蒙大师在使用“启蒙”一词时，寓有用理性之光去照亮中世纪的黑暗，以此喻示他们将进入一个摆脱蒙昧的光明时代，亦即“理性”的世纪。对这一启蒙运动的本质，西方学者多有深入探讨，其中要数著名思想文化史家 P. 盖伊的论证最为详尽。他指出，“18 世纪有许多思想家，但只有一个启蒙运动。这是一个从爱丁堡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柏林、从波士顿到费城的松散、非正式和完全无组织化的文化批判家、宗教怀疑者和政治改革家的联盟。思想家们掀起了一次喧闹的合唱，其中也有一些不调和的声音。但他们那种普遍的一致性而不是偶尔的不和谐却明晰地显示出来。启蒙运动的人们在一种其渴求至极的纲领中联合起来。这是一种现世主义、人性、世界主义和自由的纲领，而自由则在它的许多形式中占据首位，即摆脱专断力量的自由，言论自由，贸易自由，实现一个人的才能的自由，审美的自由。一言以蔽之，充满信心的人在世界上获得自己的成功的自由”。在盖伊看来，尽管启蒙思想家的言论不尽相同，启蒙思想的表现形式呈现多样化，但人的“自由”始终是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核与思想“本质”。因此，他又强调说，“启蒙运动的哲学坚决主张人的自主与自由：人应当对他本身负责，应当对他自己的理性的权利、他的自我发展负责”。由此，启蒙思想家们抨击神学蒙昧、禁欲主义和封建制度，“在这一抨击传统的斗争中，受到最沉重打击的是那种神圣的等级规范与等级观念……理性、能力甚至运气而

不是出身，正是启蒙家想以之来判断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程度”^①。“启蒙思想家要求改革，他们同时在许多伪装下要求自由——思想自由，言论与出版自由，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自由，追求事业和实现自己才能的自由。改革和自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单独希望的两个方面：自由存在于有待于完成的改革之中，而改革则存在于自由的幸福结果之中”^②。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论及法国启蒙运动时，则从阶级斗争与社会转型的角度，将其看作是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权的政治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产物，并据此指出，那些“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启蒙思想家们“不承认任何外在的权威”，而“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惟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在他们的笔下，“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生存的权利，思维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的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③。这些论述，虽然只是对法国近代启蒙运动诸特征的概括，但却为我们考察近代各个时期各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南。判定一种思想文化运动是否是近代型的启蒙运动，关键就是要看它对社会现实与文化传统的批判，是否体现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这一历史趋势，是否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变革旧的社会制度的时代要求。正因为如此，尽管由于国情的差异而导致各国近代启蒙运动各具特征，但人们仍然将法国启蒙运动后在德国（以莱辛、康德、赫尔德等为代表）、日本（以加藤弘之、西周、福泽渝吉等为代表）、中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阿拉伯世界（以阿富汗尼、阿布杜为代表）兴起的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

有关思想文化的“启蒙”，也有人从纯学术的价值取向作了

非社会变革意义的解释，中国著名的近代启蒙大师梁启超当为典型。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梁氏采用的是广义的“启蒙”概念。他指出，“启蒙”就是指新思潮、新文化从旧的传统中的结胎与初起，思想文化史上的“启蒙期”是“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在此时，启蒙家们为了标新立异而率先致力于对旧文化之“破坏”。不过，这不是单纯的破坏，而是寓“立”于“破”，“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间必已孕育”，“其研究方法正在交错试验中”。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如果就广义而言，梁氏对“启蒙”的理解应是精当的。但如从狭义上看，他所说的“启蒙”与我们所特指的近代思想文化启蒙的含义差距很大。纵观全书就不难发现，梁氏对“启蒙”的阐发始终聚焦在学术史的演进上。首先，梁氏根据佛学关于事物兴衰所经历的生、住、异、灭四阶段的历史循环论，将思想文化史的发展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启蒙”（生）、“全盛”（住）、“蜕分”（异）、“衰落”（灭），衰落之后又开始了另一个“启蒙期”。他断定，“古今中外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在论证“启蒙”时，由于梁氏注重的是学术流派的衍生更迭而不是观念形态的变迁，其所界定的“时代思潮”主要就是指某一主要学术流派的特征、风格及其研究方法。故他强调，中国自秦以后的“时代思潮”，是“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进而从“考据”的特征出发，将有清一代三百年的跨越了两种社会形态的学术看作是同一内涵的文化遗产。鉴于学术流派与社会思潮所存在的密切联系，梁氏在论及清代思潮时，也曾列举了一些学者抨击黑暗现实的言论，但他始终强调，“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恶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以此为标准，他将清代思潮的兴衰划分为几个阶段：以反对空疏保守之理学、开创经世致用之学风的顾炎武、胡渭、

阎若璩等人代表的启蒙期，以乾嘉考据学派为代表的全盛期，以借春秋公羊学托古改制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蜕分期和衰落期，而将他自己力倡实证科学的 20 世纪 20 年代称之为第二个启蒙期。显然，梁氏主要是以学术流派及其方法的承转演变来论证清代思潮的发展演变的，这正如他所云，“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④。基于这样的学术取向，他也就把自己参与发起的戊戌变法维新思潮与辛亥革命的思想解放排斥在“启蒙”主潮的范畴之外。显然，梁启超在这里所谓的“启蒙”，与意味着近代思想解放的“启蒙”，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我们在依据它来分析中国的近代启蒙运动时，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二、东、西方近代早期启蒙的类型与主旨

一般而言，将近代思想启蒙定义为新兴资产阶级批判传统、变革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没有歧义的。但如果要具体考量东西方近代早期思想启蒙并进行比较，则情况就更加复杂。在 14 世纪—16 世纪的西方，曾经历了近代早期的反神权与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而在东方（如中国、日本与阿拉伯世界），尽管在封建社会末期也曾经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思想裂变，但就整体而言也只是传统文化内部的调适与整合。如果我们放开历史视野来进行历史比较考察，就会发现，在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由于东西方社会经济状况、政治态势与文化传统的差异，其近代早期的思想启蒙在社会根源、表达形式、理论主旨等方面实际上都是难以契合的，必然体现出“西方式”与“东方式”的鲜明特征。

“西方式”的近代启蒙运动，是一种“内源”式的文化启蒙。这一启蒙运动尽管不同程度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如阿拉伯文

化对文艺复兴、中国儒学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但它所勃兴的动力源，主要是来自其自身的社会。正是由于其社会内部新的经济形态与政治势力的崛起，才酝酿起新的文化群体与思想新观念，进而完成对原有文化传统的批判更新。文艺复兴运动与 18 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则是这一运动的典型。

“东方式”的近代启蒙运动，则是一种“外源”式的文化启蒙。与西方相比，东方社会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尚无产生促成社会向近代转型的新因素，或者社会中的新因素尚不足以完成这一目标，新的文化群体与思想观念缺乏适合于植根的社会土壤。因此，即便有仁人志士欲图在思想文化领域除旧布新，也只能是对文化传统的修补、调整或部分切换，而不能真正构建起新的思想体系。而在东西方社会发展日益不平衡的历史大趋势中，东方社会最终只得依靠“西学东渐”浪潮的刺激或推动来掀起近代启蒙思潮。

就“早期”与“成熟期”的划分来看，由于“动力源”的不同，东西方的启蒙运动也颇有殊异。从 14 世纪开始，西方社会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的历史转型经历了约 4 个世纪才得以完成。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成长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并最终推翻了基督教神权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过程。转型时期新旧社会矛盾的缘起与冲突渐次展开，不仅促使了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为近代启蒙运动的酝酿输送了“源头活水”，而且也使得其近代启蒙运动体现了“前呼后唤”、层层推进的连续性，由此而产生了 14—16 世纪的文艺复兴这一近代早期启蒙运动与 18 世纪成熟的近代启蒙运动，并使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由于新兴社会力量尚未成熟，文艺复兴时期抨击神学蒙昧、禁欲主义，颂扬人的自由、尊严与欲望的人文主义思潮，还带有神学传统印痕，体现了新旧观念交织的过渡特征，但它却以一种新的“人本”价值取向彰显了其近代思想启蒙的意义。作为文艺复兴

之精神动力的人文主义思潮，显示的是“个体本位”的取向，即一切以个人的意志、欲望和利益作为人自身观察、思考与评判万事万物的是非标准或价值尺度。故有人指出“种种个人主义的观念，是人文主义的表现特征”^⑤。人文主义批判中世纪神学的蒙昧、禁欲说教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颂扬个人的自由、平等与欲求，最终实现了“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开启了近代思想文化的先河。因此，“文艺复兴史”又被西方学术界称之为思想文化与宗教信仰领域中的“个人复兴史”^⑥。同时，文艺复兴的这一思想取向，为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自由”理念提供了精神坐标。诚如史家指出，“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受益于文艺复兴的学术成就，受益于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哲学”^⑦。

相比之下，由于社会发展进程的缓慢和与西方社会日渐拉开的时代距离，中世纪晚期的东方社会没有出现西方的那种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而是在日后近代西方殖民扩张中出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断裂，由此开始与传统社会逐渐分离，迈入了充满屈辱与险境的“被近代化”（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的轨道。因此，“东方”式的近代启蒙运动也就不可能走那种“西方”式的道路，而是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开始了独特的酝酿过程。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西方近代的制造技术、科学与西方的思想文化，包括教育、出版制度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政治思想乃至日常的生活风气等等，逐渐输入东方社会，导致了东方文化传统的裂变与转型。在这一过程中，面对西方殖民侵略的步步紧逼及其所导致“亡国灭种”的危机，东方社会的进步文化群体为了挽救民族、振兴国家，开始对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深刻反思，并向扑面而来的“西学”浪潮中汲取营养，由此而逐渐酝酿起其特定的近代启蒙。在此情况下，与西方的那种从挺立个人自由并将此扩展到整个思想领域的启蒙道路不同，东方的启蒙运动则以全民族的“救亡图存”、“除弊图新”作为其思想主旨。此

外，东方的近代早期启蒙，最初一般都是由传统型文化群体所促成的，并且始终聚焦在民族独立解放这一思想主旨上，带有“自上而下”的“被动式”的改良主义色彩。只是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与新的文化群体的诞生，东方近代启蒙运动才开始走向成熟，包蕴着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与索求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双重内涵。不过，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东方”式的近代启蒙在各国实际上也不尽相同。

在日本，在隋、唐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传统社会结构具有自己的特点，封建“幕府政治”是独立并实际凌驾于天皇政府之上的封建军事贵族的统治体制，与东方君主专制统治仍有一些差异；受益于海上贸易而成长起来的城市，在中古后期曾一度出现了“自治”现象；其特有的“武士道”传统，只是作为维系封建主内部的统属关系的精神纽带而存在。正因为如此，德川幕府时期所推行的“锁国”政策，很快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近代早期思想启蒙迅速成长。明治时期，近代早期启蒙团体“明六社”就以解决“民族主义任务”为启蒙主旨，同时又较早地将伸张“国权”与伸张“民权”紧密结合起来，力倡守“本”变“用”，熔“东洋道德”和“西洋技艺”于一炉，使国家走上近代化的轨道，使本民族免受欧美列强的宰割。不过，“明六社”的成员多为传统的文化群体，其启蒙思想的传播也得益于正在设法铲除“幕府”的天皇政府的支持。因此，这一近代早期的“‘启蒙’便始终‘由上而下’，即主要是依靠以绝对官僚主义为中心的旧的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来推行的”，具有“启蒙专制主义的局限性”^⑧。

在阿拉伯世界，“东方式”启蒙的酝酿并不容易。闭塞的封建经济、哈里发的专制统治与牢固的伊斯兰教神学文化传统对外来文化具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力，而中世纪穆斯林与基督教西方的大冲突，更使这一文化排斥力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不过，

自19世纪受到近代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始，穆斯林的意识形态也开始酝酿着启蒙。一些深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逐渐冲破民族隔阂与宗教纷争的壁垒，向扑面而来的“西学”浪潮中寻找民族振兴与国家独立的锁钥。阿富汗尼倡导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在对西方殖民侵略进行抨击的同时，摒弃了传统“复古主义”的价值取向，着重考虑伊斯兰教文明如何向近代形态转换，将伊斯兰教的演进与社会现实的发展方向结合起来，由此而提倡宗教改革，纯洁信仰，并借鉴“西学”来拯救穆斯林面临的危机。而以阿布杜发起的“现代主义”思潮，反对中世纪的正统学派，对经典的曲解与对人的独立判断精神的钳制，主张回归到《古兰经》等原典中去发掘真理，并按照现代化的需要来变革神学传统。同时，大力倡导吸取近代西方科学文化，来实现伊斯兰文明的复兴。阿布杜曾宣称：“欧洲人现在已经插足于世界各地，英国人抵达阿富汗，法国人占领了突尼斯。事实上，这些篡夺、侵略与政府的行动并非是来自法国或英国。相反，是科学在到处证明它的伟大力量。在科学和知识面前，愚昧除了卑下的屈服外别无选择”。^⑨这一“现代主义”思潮还从政治制度层面批判了穆斯林君主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他指出：“我们规劝埃及民族相信，一个统治者，虽然对他的服从是应尽的义务，但他也仅仅是一个人，他常常相信错误，沉湎于怪想。除了整个民族通过语言与行动给予他建议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他犯错误，遏止他的怪想的主导趋势。”^⑩基于这样的认识，“现代主义”思潮将西方科学文化、正义与平等的原则乃至西方的议会民主制，都看作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因素，竭力地以伊斯兰教神学为本位，将这些因素吸纳与整合起来，完成穆斯林社会从传统向近代形态的过渡。

中国近代早期启蒙可以说是“东方式”启蒙的典型。长期以来，建立在封建小农经济与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